

何
辉

著

龙影

——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

THE SHADOWS
OF THE DRAGON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何
辉

著

龙影

——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

THE SHADOWS
OF THE DRAGON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安新文

责任校对：张红霞

封面题签：何 辉

封扉设计：赵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何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0
ISBN 978-7-01-015236-3

I. ①龙… II. ①何… III. ①国家-形象-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1690 号

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

LONGYING XIFANG SHIJIE ZHONGGUO GUANNIAN DE SIXIANG YUANYUAN

何 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5236-3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卷 • /29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中国 /31

《世界境域志》中的中国 /50

第二卷 • /57

柏朗嘉宾对东方民族的印象 /59

鲁布鲁克提到的鞑靼、契丹及大契丹 /64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国 /70

《海屯行纪》中的中国 /99

《鄂多立克东游录》中的元代中国 /103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记述的明代中国 /116

第三卷 • /139

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地理的知识和观念的来源 /141

17 世纪后半期中欧交往中的中国形象 /148

利玛窦所描绘的中国 /154

《耶稣会士书简集》中的中国 /169

第四卷 • /211

孟德斯鸠著作中的中国形象 /213

伏尔泰《风俗论》中的中国 /223

黑格尔观念中的中国：剖析与考辨 /238

倪维思的中国观念 /259

巴尔福《远东漫游》中的中国 /268

阿林敦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290

邓恩著作中的耶稣会巨人和中国 /296

后 记 /313

绪 论

西方知道中国，肯定不是源自一个途径。学界基本公认，西方从陆路和海路两大途径认识了遥远的中国。

认识事物，离不开用来指称某事物的名称或概念。西方人知道的最初指称中国这个国家的名词是什么，这是研究者一直关心的问题。

英国学者裕尔（H. Yule，又译玉尔、玉耳等，本书中统一译为裕尔）、法国学者考迪埃（Henri Cordier）等发现，在古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与西方相距遥远，“在不同的时代，它或者被视为沿亚洲巨大的半岛和岛屿形成的南部海路的终点，或者被视为横穿亚洲大陆的北方陆上通道的终点”，总是朦胧若庞然大物。传到西方的指称中国的名称，源自海路的，是 Sin, Chin, Sinae, China 等，源自陆上的则是 Seres, Cathay 等。^①

Chin 被认为是经由马来人传下来的，是他们对秦王朝的称呼。裕尔等人认为 China 一名则在更早时就已经使用，因为早于秦王朝（公元前 2 世纪建立）许多世纪的《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中就提到了 Chinas，这是一个堕落的刹帝利种姓，虽然这两部作品中显示的这个国家地理位置不准确。但是，裕尔在《英一印字汇》（*Hobson-Jobson*）中进一步指出，古代梵文中尽管

^① 参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 页。

有 Chinas 一词，但它可能并不是指中国。他还介绍了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和拉古伯里（T. Lacouperie）的不同观点，前者认为欧洲人指称中国的 China 一词来源于东京的旧称“日南”，后者则认为该词相关词语是由古代滇国经过红河河口传向远方的。翟理斯（Giles）则认为，Sinae 这个名称来自于秦王朝（Ch'in, Ts'in），其尾部的 a，则是由葡萄牙人添加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不赞同李希霍芬的观点，他认为印度人确知的 Cina，Chinas 无疑指中国人，帕莱德·马丁尼（Padre Martini）提出的 China 之名来自秦王朝的观点较有说服力。赫尔曼·雅各比（Hermann Jacobi）发现，完成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的印度著作《政事论》中提到了 China，特别提到丝带产于 China。这是一个牢固的证据。因此，China 之名来自秦朝的传统语源论依然最具说服力。^①

“赛里斯”（Seres）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文献。其一，被认为出自活跃于公元前 400 年前后的克特西阿斯（Ctesias），文曰：“据说，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有人见到过他们，有 13 腕尺之高；可以活到 200 岁”；穆勒（Müller）指出，这段文字仅见于福提乌斯的《文库》（*Bibliotheca of Photius*）手稿，且文中其他事例使人怀疑这段文字是否真是出自克特西阿斯之手。^② 张星烺也指出，根据后人考证，这段文字为后来委托，所言不足据，只是其中出现了赛里斯之名，这倒是事实。^③ 其二，见于斯特拉波（Strabo）的一处或二处文字。张星烺指出，斯特拉波是希腊地理学者，生于公元前 54 年，卒于公元后 24 年，著有游记，其中引用了克特西阿斯的记载。^④ 穆勒认为，斯特拉波的文字似乎引自奥奈斯克里图斯（Onesicritus），后者是亚历山大的部下，活跃于公元前 328 年。^⑤ 此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在位时，

① 参见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3 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 12 页。

③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119 页。

④ 同上书，第 120 页。

⑤ 转引自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2 页。

诗人马罗 (P. V. Maro) 的诗中屡见赛里斯之名, 但是对赛里斯的位置不清楚, 只知道它在中亚细亚及极东地区。

在《圣经》的《以赛亚书》(Isaiah 49: 12) 中, 提到一个远方的国家名叫 Sinim (和合本为 Syene)。该词在《圣经》和合本中译为“秦国”。^① 裕尔认为它所表示的就是中国。但是,《以赛亚书》除了提到它距离耶路撒冷很远之外, 并没有更多的信息了。裕尔认为 China 这个词后来就是以这种形式传给希腊人和罗马人, 可能是经过操阿拉伯语者之中介, 因为阿拉伯语中没有 Ch 音, 所以讲印度和马来人的 China 转为 Sin, 可能有时也转为 Thin。^②

关于西方人指称中国的 China 等词的语源问题, 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裕尔的《西域纪程录丛: 古代中国闻见录》, 在此不再详论。本书更关心的是, 从古至今的西方文献中, 是如何记述中国的, 以及这些记述所包含的中国观念。

《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又译《厄立特里亚海会航记》) 是一部较早提到中国的书。这部书的诞生年代大约在公元 1 世纪后半期 (穆勒给出的时间更精确的时间为公元 80—89 年^③, 有的观点认为是 2 世纪初或 3 世纪初^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希腊商务代理人, 化名为阿里亚努斯写作此书。他的航行始于东非, 沿着红海的非洲海岸航行, 后来到了克里塞岛 (马六甲)。书中这样提到中国: “在该国的后面, 大海止于在秦国 (Thin) 的某处, 在秦国内地颇近北方处有一称为秦奈 (又译秦尼^⑤) 的大城, 从里生丝、丝线和丝料沿陆路通过巴克特里亚被运到婆卢羯车 (Barygaza); 另一方面, 这些货物由恒河水路被运至利穆里斯 (Limyrice)。但是, 要进入

① 《圣经》,《以赛亚书 49: 12》, 和合本第 1160 页。

② [英] 裕尔著, [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 古代中国闻见录》, 张绪山译,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第 9 页。

③ 转引自 [英] 裕尔著, [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 古代中国闻见录》, 张绪山译,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第 144 页注释 1。

④ [埃及] C. 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 非洲古代文明》第 2 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版, 第 429 页。

⑤ 赫德森:《丝绸贸易》,《中外关系史译丛》第 3 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292 页。

秦国并非易事，从秦国来的人也很稀少。秦国处于小熊星座的正下方，据说其国疆境毗邻滂突斯（Pontus）和里海的远岸，旁边的迈奥提斯（Maeotis）湖与大洋相通。”^①从该书所记的秦国的疆域来看，更接近于汉的疆域。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秦灭亡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东南亚地区的人所知，所以在马六甲一带，人们依然用接近于“秦”的名称来称呼远方的中国。但是，不论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称呼中国的，这个遥远的国家产丝的事实已经被肯定。这恐怕也是西方对中国的第一个主要印象。

在西方古代文献中，“秦奈”和“赛里斯”是经常出现的两个名称，它们似乎都指向古代中国的方位（多指向中国北方），但不同作者对它们地域与方位的记述是有差异的。在古代希腊罗马文献中，这种现象也很明显。所以裕尔说，“对于如此遥远的人民，希腊罗马人对其确切方位充其量只有朦胧不清的认识……在不完备的知识状态中，距离较远的统治民族的名称有时被用于它近处的从属民族身上，周边临近民族的特点被移到统治民族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②

普林尼（Pliny）《自然史》（约公元23—79年）中提到在斯基泰人居住地以东居住是赛里斯人，“他们以其树木中出产的羊毛，而闻名遐迩。赛里斯人将树叶上生长出来的白色绒毛用水弄湿，然后加以梳理，于是就为我们的女人们提供了双重任务：先是将羊毛织成线，然后再将线织成匹。它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辛劳，而取回它则需要从地球的一端翻越到另一端：这就是一位罗马贵夫人身着透明薄纱展示其魅力时需要人们付出的一切。”^③“赛里斯人举止温文敦厚，但就像其树林中的动物一样，不愿与人交往，虽然乐于经商，但坐等生意

① 参见《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4页。

② 转引自[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16页。

③ 参见[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史》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8页。

上门而绝不求售。”^① 普林尼还转述了关于赛里斯人外貌的传言。据说，“赛里斯人身材高大，超乎常人，红发碧眼，说话声音沙哑。”^② 根据传言，赛里斯人做生意时不说话（哑市），“做生意时似乎对出售的奢侈品并不重视，他们对商货流通之对象、目的地和结果似已了然于心。”^③ 普林尼所记述的赛里斯人可能确实是古代中国人，因为关于赛里斯人地区出产羊毛（尽管说羊毛生在树上是错误的），赛里斯人用羊毛制造丝纱的记述与中国古代史载相符。但是，关于赛里斯人外貌的传言，有些奇怪。这一点，普林尼自己可能也不太相信，所以在记述时是通过别人的故事讲出来的。《自然史》中关于赛里斯国和赛里斯人的记述，说明古代希腊或者说古代西方与古代中国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他们对于遥远的中国（赛里斯）的知识，是来源于因贸易而周游各地的商人。有些到达西方的商人，本人可能也并未到过中国，而是从别的商人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的传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赛里斯的记述中，有一部分符合事实，而另一些部分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事实中混杂了关于未知事物的想象。

梅拉（Mela Pomponius）的《世界志》（约公元 50 年）中提到，“居于亚洲最东端的是印度人、赛里斯人和斯基泰人。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居两端。赛里斯人居中间。”^④ 具体说，赛里斯人居住在塔比斯山（Thabis）和陶鲁斯山（Taurus）之间。“赛里斯人以诚实著称，也以其贸易方式而闻名。他们的贸易方式是，把商货放在无人的地方，然后躲起来等待买卖成交。”^⑤ 梅拉所言的赛里斯人可能就是古代中国人。

裕尔认为，“在罗马史上，只有唯一的晦暗不明的痕象表示罗马人与赛里

① 参见〔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史》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60 页。

② 同上书，第 161 页。

③ 同上书，第 161 页。

④ 参见梅拉《世界志》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57 页。

⑤ 同上书，第 157 页。

斯人进行过实际的外交交往：历史学家弗劳鲁斯（Florus）记载，在远道而来向奥古斯都寻求友谊的各国使团中，也有来自赛里斯国的使节。”^① 考迪埃指出，佛劳鲁斯提到的赛里斯人也许是访问罗马的私商，但肯定不是外交使团。^② 中国史书中记载甘英是第一个抵达大秦（罗马）的中国人，时在公元97年。不过，即便弗劳鲁斯所言的远道到达罗马的不是使节而是私商，他们也一定向罗马传输关于中国的某些知识。

约写于公元150年的托勒密首先使用了塞拉（Sera）和赛里斯（Serice）两个名字，前者指赛里斯人的首都，后者指其国家。^③ 他的《地理志》中还提到秦奈国（Sinae）。按照他的计算，赛里斯国处于维度很低位置。他说秦奈国之北毗邻赛里斯国部分地区，东和南为未知地，西部接恒海外的印度。秦奈海湾岸边居住着以鱼为食的埃塞尔比亚人。“但据称秦奈都城实际上既没有铜墙，也没有任何值得称述的东西”。^④ 托勒密在《地理学》中一开始便指出，创作此书目的是俯瞰人类居住的“全部”世界，他利用投影法制作了世界地图。虽然托勒密使用了经纬度（在他之前马里努斯已经发明了经线纬线）来说明各国各地的方位，但实际上非常不准确。在“托勒密世界地图”上，秦奈国（中国）位于东端，与目前的地图相比，亚洲大陆、印度半岛等一些岛屿的比例误差严重。（那不勒斯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5世纪修复的“托勒密世界地图”）这说明，当时西方对于远方的中国基本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于中国的方位、大小、海岸线几乎一无所知。托勒密的关于中国的描述基本上来自于传说和猜想。

古代交通不发达，人们地图测绘技术也较为落后。一个地区的人们关于远方国度的认知，往往长期停留在少量事实混合大量传说的阶段。西方关于中国

①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15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④ 参见托勒密《地理志》摘录，原译文见[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6页。

的认知，也长期充满了误解和扭曲的成分。包撒尼阿斯的《希腊道程》（约174年）中也记载了一些关于赛里斯人的传说。普林尼曾认为中国织造的丝源自于生于树上的羊毛，包撒尼阿斯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说，“赛里斯人用来做衣料的丝线，不是长自植物，而用其他方法获取。”^① 他说赛里斯国有一种希腊人称为“赛儿”（Sér）的虫子，这是这种虫子产出了丝，赛里斯人通过养这种虫子而获得丝线。尽管包撒尼阿斯在这个问题上比普利尼更为正确，但是他并不知道这种虫子叫做“蚕”，对于它的特征、生长、饲养和产丝过程的记述，也充满了错误。《希腊道程》中还记载了关于赛里斯国地理和人种的传说，不过几乎都是错误的。通过记述来看，到了包撒尼阿斯时代，有人依然认为赛里斯人是埃塞俄比亚种，但也有人认为赛里斯人是斯基泰人和印度人的混血种。

约公元380年，阿米阿努斯·马赛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在《历史》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赛里斯国（他认为赛里斯国是波斯的一个省）的方位和地理特征，其准确性远胜于他的前辈作者。下面是《历史》中关于赛里斯国的描述内容的摘录：“在斯基泰两部落以远、向东的地区，赛里斯国为高山所环绕，形成连绵不断的屏障。赛里斯人就安居于这块富饶而广阔的平原上。西与斯基泰人接壤，北和东部毗邻人迹罕至的莽莽雪野，南部疆界则延伸至印度和恒河……四周为陡峭悬崖所环绕的赛里斯平原，有奥恰尔德斯（Oechardes）和鲍提斯（Bautis）两条河流贯流其上，河流平阔，水流潺潺、河道蜿蜒……赛里斯国气候迷人，空气清新健康；天气晴朗，和风习习；森林广袤，人行其中，仰视不见天日。”^② 然而，他几乎是重复了普林尼的错误，说赛里斯国森林中出产一种毛，人们往这种毛上洒水，然后梳理成丝线，继而纺织成丝绸。关于赛里斯人，他写道：“赛里斯人于极为安宁静谧的生活中度

① 参见包撒尼阿斯《希腊道程》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3页。

② 参见马赛利努斯《历史》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4页。

日，甚至不动用武器、斥诸战争。性喜安静平和，以恬静的生活为最大的乐趣，所以从不扰挠他国……赛里斯人性习俭约，于平和中读书度日，避免与他人接触。外国人渡过河去到他们那里购买丝绸或其他商货时，仅以目光议定价格，并不交谈。赛里斯人生活中无所缺乏，所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产品，但并不向他人购买东西。”^① 在这段记述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普林尼的影子。不过，马赛利努斯说赛里斯人生活中无所缺乏，只卖不买，加之他关于赛里斯人安静平和、喜好和平的记述，倒是隐约透露了一个信息，即自公元1世纪初（西方的普林尼时代）到公元4世纪以来，古代中国已经逐渐呈现出一个物产丰富的、自给自足的大国面貌。公元380年，中国处于东晋时期，之前已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各朝，除了三国纷乱之外，经过了长期的统一过程。从马赛利努斯的记述来看，西方对于这一时期古代中国喜好和平的印象要远远超过它参与战争的印象。这恐怕与自西汉以来中国统一的时期超过分裂的时期有关。

普罗可比（Procopius）的《哥特战争》^②（公元500—565年）记载了蚕种传入罗马帝国的经过。当时查士丁尼皇帝想要减少对从波斯人购买丝绸的依赖性，正好有几位来自东方的修士来到罗马。这些修士自称曾长期居住在一个有很多印度人、名叫赛林达（Serinda）的地区，学会了如何培植蚕卵的方法。于是皇帝派他们返回东方，将蚕卵带回了拜占庭。书中所说的赛林达可能就是中国的南部。裕尔转述了穆勒关于塞奥凡尼斯（Theophanes）关于蚕种传入罗马的记载。塞奥凡尼斯与普罗可比的记载略有不同。他记载中说有一位波斯人离开赛里斯国时将蚕卵藏在手杖中带到了罗马。张绪山指出，此时拜占庭由查士丁二世统治。因此，此事件与发生在普罗可比记载的查士丁一世时期的蚕种传入罗马可能不是同一事件。塞奥凡尼斯提到，当时罗马皇帝让突厥人观看

① 参见马赛利努斯《历史》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4页。

② 参见普罗可比《哥特战争》，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5—166页。

了与蚕吐丝之法，令突厥人大为吃惊。他还说，当时突厥人控制了原来由波斯人控制过的港口，这些港口，是赛里斯人经常出入的。裕尔认为，这里提到的港口，肯定位于信德（Sind）地区，因为有记载中国人当时已经到信德经商，所以塞奥凡尼斯的段记载，就成了考订赛里斯人和中国人为同一民族的最后一个环节。

拜占庭查士丁二世继位后第三年（567年），哒哒帝国亡于西突厥。随后，突厥与波斯慢慢走向敌对。于是，原来臣属于哒哒的粟特人建议西突厥与罗马人（拜占庭）建立直接联系，将生丝销售给他们。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①（6世纪末）中记载了突厥和拜占庭帝国的交往。书中提到的生丝生意是促成突厥和拜占庭谋求友好关系的主要原因。弥南德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段历史记载，因为正是在这段记载中，可以详细地获知突厥与当时拜占庭、波斯的关系。众所周知的是，在这一时期，在突厥的东方，中国的历史正在步入隋唐时代。于552年崛起的突厥，到6世纪末，已经成为拜占庭、波斯和中国三大文明之间的纽带。它与三大文明建立了长短不一的联系，并对商业的自由流通持支持态度。正是伴随着商业的流通，东西方信息与文明加速交汇。

如果说在普罗可比《哥特战争》和弥南德《希腊史残卷》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通过陆路认知中国的过程，那么在科斯马斯（Cosmas）的《基督教风土志》^②（蒙特福康 [Montfaucon]、裕尔认为写作年代约在530至550年之间）中，则可以看到西方通过海路认知中国的痕迹。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远洋航行的艰难和地图测绘技术的局限，西方自海路认知中国直到6世纪末依然非常有限。在《基督教风土志》中，科斯马斯将地球视为一个长方形的平面，宇宙看起来则像个带着穹顶的长方形盒子，他对海洋面积、大陆

^① 参见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7—180页。

^② 参见科斯马斯《基督教风土志》，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1—201页。

面积的计算则误差巨大，提及远方的中国时依然晦暗不明，但对于中国位置的认识却比较准确。在此书中，中国被称为秦尼（又译秦尼扎）（Tzinitza）和秦尼斯达（Tzinista）。“赛里斯”的名字似乎在他那个时期已经不用了。科斯马斯指出，该国出产丝绸，并运往印度洋中的大岛塔普罗巴奈（Taprobane，即锡兰）。值得一提的是，科斯马斯认为，“秦尼斯达以远再没有其他国家，因为大洋从东方环绕秦尼斯达国”^①；麦克林德尔（McCrindle）指出，“科斯马斯是确知中国东界为大洋的第一人”^②。科斯马斯的描述，尽管没有明确勾勒出中国东部的海岸线，但是，他使西方对中国在世界版图中所处的位置进一步清晰化了。

在7世纪早期的拜占庭作家塞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的《历史》中，提到一个叫做“桃花石”（Taugas, Ταυγᾶς）的东方大国，说该国原来是突厥的殖民地，但现在该民族的力量与人口在世界上罕有匹敌。他还写道，该国首都距离印度1500哩，国内盛行偶像崇拜，有公正的法律，从商业活动中获得大量财富，一条大河将国土划分为二，在毛里斯（Maurice，582—602年的拜占庭皇帝）皇帝君临罗马时，黑衣国跨过大河攻击红衣国，获胜而统一全国。科拉普罗特（Klaproth）指出，塞奥菲拉克图斯所提到的大河是长江，黑衣国则是渡过长江打败陈朝而统一中国（589年）的隋朝。裕尔接受此观点。^③塞奥菲拉克图斯还提到了库姆丹（khubdan）城，这是突厥和西亚民族对长安的称呼。但是，塞奥菲拉克图斯自己并不知道桃花石这个国家就是中国。裕尔指出，德经（Deguignes）首先证明塞奥菲拉克图斯所说的桃花石国就是中国，吉朋（Gibbon）接受了这一观点，科拉普罗特也做了同样的解释。张绪山认为，从语源上，“桃花

① 参见科斯马斯《基督教风土志》，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8页。

② 转引自[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8页。

③ [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页。

石”是“大汉”的音转，是匈奴和北方草原民族对汉帝国的称呼；西突厥在中亚兴起后与拜占庭帝国发生交往，将此名传输给后者。^① 塞奥菲拉克图斯的著作表明，在7世纪早期，拜占庭开始意识到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强盛的大国存在，但是对这个大国的具体情况却不明了。西方人的心中，中国正在以一种模糊的庞然大物的形象浮现。

大约诞生于9世纪中期的《中国印度见闻录》^②（公元1199年左右完成校对的抄本）反映9世纪中国的一些情况，其丰富程度与细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作品。公元9世纪后期出生、卒于956年的阿拉伯人马苏第（Maʿūdī）著有《黄金草原》一书，他曾于915年到达中国海，在其著作中记述了黄巢起义攻陷广州之事。他并未到达过广州，其书中关于黄巢攻陷广州的记述，可能参考了《中国印度见闻录》，也可能是来自于同时代的阿拉伯商人的传说。^③

难以辨别准确成书年代的《伊本·穆哈利尔游记》^④中提到的中国显然是一个东方大国。该书提到陀拔（Tobba）军队入侵中国。陀拔可能就是吐蕃。该书记述说，在从突厥诸国进入中国边境处有一处谷地，该谷地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宜人生活的地区之一，中国君主在此驻有军队，进入中国的人在此驻留3日，费用由中国国王供给，然后获准登程。“离开谷地后，使团旅行整整一天时间，到达中国首都信达比尔（Sindabil）。国王的宫殿就在这里。使团夜宿城外，距城尚有一哩路程。清晨早起动身，一整天奋力赶路，在日落西山时抵达城中。城市规模宏大，其长可行一日，有60条笔直的大街以王宫为中心辐射开来。（王宫？）城墙高90骨尺，厚90骨尺；墙顶上有流水，分60条支渠传达到各城门。每一支渠流及街道，返回王宫，所以每一街道有两渠水逆向而流。其一供水，另一条将水排出。城内有一座大庙宇，围墙很大，比耶路撒冷

① 张绪山，《桃花石（Ταυράς）名称源流考》，《古代文明》2007年第3期。

② 《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③ 参见〔古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 参见《伊本·穆哈利尔游记》概要，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见闻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0—220页。

城的城墙还高大，内有雕像和宝塔。政府组织极为严密，法律严明。禁止杀生为食，杀生为大罪。国王学识渊博，聪明智能、待人仁惠。伊本·穆哈利尔受到国王的友好接待，直到婚约订立妥当；随公主同行相伴有 200 名奴仆和 300 名侍女，这些人随公主前往呼罗珊，与诺亚王子成婚。”^① 这件事如果是史实，最可能发生的时间是 9 世纪晚期和 10 世纪，因为这段时间是萨曼王朝统治下的呼罗珊和中亚河中地区的全盛时期，此时与呼罗珊联姻的中国，可能是处于衰落中的唐朝。

12 世纪初一些阿拉伯手稿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记述。13 世纪的志费尼（Juvaini）《世界征服者史》^② 中记述了成吉思汗至旭烈兀西征期间的大量史实。蒙古铁骑征杀残酷、所向披靡的形象在伊朗及周边地区的确立，与这部书不无关系。拉施特·阿丁（Rashīd-ad-Din）的《史集》^③（尤其是其中《中国史》部分）也是了解蒙古帝国不可忽视的史料。

12 世纪后，西方文献关于中国的记述日益增多，其中阿拉伯的文献也为西方了解中国做出了贡献。13、14 世纪有关于中国记述的重要文献有《马可波罗行纪》（1296 年口述），《海屯行纪》（写于公元 1307 年），《鄂多立克东游录》（1330 年口述），阿布尔菲达的《地理志》（1331），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等。马可·波罗东游时，忽必烈为蒙古大汗。马可·波罗认为当时忽必烈汗是世界一切鞑靼的君主，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拥有财物最多的君主。元朝的建立，使中国与鞑靼两个概念渐渐交杂，当时西方关于中国的印象，因此也融入鞑靼的内容。对像法兰西这样的欧洲国家而言，元朝依然是遥远的而神秘的。《海屯行纪》记录了海屯前往蒙哥汗驻地后又返回的过程，其中记录了大量地名，尽管从文字上并未提到“中国”两字，但是它关于蒙古帝国、契丹和相关国家的记载，明显增进了西方

① 参见《伊本·穆哈利尔游记》概要，原译文见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丛录：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16 页。

② [伊朗]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③ [波斯] 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